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集刊



主 编 何 明
副主编 李志农 朱凌飞

西南边疆民族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研究

第18辑



云南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集刊



研究 西南边疆民族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第18辑

主 编 何 明
副主编 李志农 朱凌飞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第 18 辑 / 何明主编.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 - 7 - 5482 - 2443 - 3

I. ①西… II. ①何… III. ①少数民族—西南地区—
年刊 IV. ①K280.7 -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2171 号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第 18 辑

主 编 何 明
副主编 李志农 朱凌飞

策划编辑: 张丽华
责任编辑: 张丽华
封面设计: 刘文娟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制版印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2443 - 3
定 价: 58.00 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65031071/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主 编：何 明

副主编：李志农 朱凌飞

编委会

主 任：林文勋

副主任：刘世哲

委 员（按姓氏排名）：

Chayan（泰国清迈大学） 陈庆德 高丙中 李东红 麻国庆 马翀炜

彭静莲（比利时鲁汶大学） 王文光 徐黎丽 杨 毅 袁同凯 周 平

周永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目 录

☆理论与方法

家的传承与民族认同：方洞瑶族追踪调查与再研究

——《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序 …………… 麻国庆 (1)

史禄国与中国学术界关系考实

——以“云南调查事件”为中心 …………… 王 传 (7)

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生态学 …………… 吴英杰 (17)

☆边疆研究

景颇族女性眼中的毒品问题 …………… 张丽虹 (23)

腹地变迁：近代云南三关贸易地位形成的空间过程 (1889—1937) …………… 张永帅 (31)

民国边疆危机与阿尔泰城市发展初探 …………… 付 娟 (47)

制度创设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区域治理及城市发展 …………… 付志刚 (54)

跨国茶叶贸易与亲属关系实践

——对老挝丰沙里“搭老表”现象的人类学解读 …………… 郭静伟 (61)

☆民族史研究

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相关问题浅论 …………… 王文光 王 尉 (72)

民国时期凉山彝区“四十八甲”研究 …………… 秦和平 (78)

清代云南回族人口规模变动研究 …………… 路伟东 王新刚 (90)

☆传媒与文化研究

作为民俗文化文本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 邴 波 (102)

人物、报媒与时代：《申报》甘地报道趋势研究 (1922—1949) …………… 应厚非 陈舒慧 (110)

☆语言人类学研究

“母尊女贵”：永宁摩梭人女性社会性别的语言实践与建构 …………… 许瑞娟 (117)

民族语言学视角下的希伯来语复兴原因探析 …………… 王文俊 (123)

☆ 宗教人类学研究

- 巫术起源的“焦虑说”辨析 李世武 (129)
- 荒谬中的逻辑: 人类学仪式与宗教研究 刘 涛 (135)

☆ 法律人类学

- 转型期边疆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 解释路径与理论框架 杨鹏飞 (142)
- 社会变迁中回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
——以巍山永建镇西树龙为例 杨惟钦 (150)

☆ 文化与社会研究

- 论少数民族社会中的敬老伦理观 张 跃 (160)
- 藏族木碗及其文化内涵初探
——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奔子栏、上桥头两村为例 廖惟春 孙志娟 刘虹每 (168)
-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女性身体审美 陈树峰 (176)
- 文化展示中的“花街节”与花腰傣集体记忆 周晓红 (182)
- 西双版纳傣泐的命名制分析 徐伟兵 (189)

☆ 研究述评

- 藏族生态移民研究回顾与展望 冯雪红 王玉强 (197)
-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生态人类学丛书》书评 李继群 (204)
- 女性主义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女性主义与人类学》评介 陈明君 (212)

☆理论与方法

家的传承与民族认同：方洞瑶族追踪调查与再研究

——《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序

麻国庆*

摘要：家在具有较强流动迁徙特性的勉瑶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一书对杨成志先生早期在乳源瑶山田野点进行了追踪研究，对勉瑶的家进行了文化与社会结构两方面的细致分析。书中作者强调以夫妻为主轴的家的纵向延续理想在构建过山瑶的亲属制度、社会结构、族群文化、历史记忆、民族认同及国家想象等过程中的价值。在不同民族共生的中国，家族的视角是研究不同民族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切入点。对于民族的研究不能离开家族这个参照系。

关键词：家；民族认同；追踪研究；《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

DOI: 10.13835/b.eayn.18.01

我一直关注华南的瑶族等山地民族在民族与国家、族群与区域、中心与周边、全球与地方等学术范畴中的意义。为此，我在华南区域，尤其是南岭走廊做过多次田野调查。1989年，我和黄淑婷老师带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本科生前往广东阳春的铁岷瑶族村寨做暑期田野实习。1990年，我到北京大学跟随费孝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陪同他前往南岭一带做田野考察。在湘西南，与粤赣交界的汝城县，我们发现有一群人自称“延寿人”，语言、习俗等均与周边群体有一定差异，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将他们识别为“瑶族”。^①2004年和2008年，我曾先后两次对颜复礼和商承祖所调查的广西凌云瑶族地区进行追踪回访。2010年和2012年，我又分别带领本科生赴广西龙胜潘内红瑶村寨和广东连南油岭排瑶村寨进行追踪回访。

何海狮的这部关于南岭走廊瑶族的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亦是对我一直关注的话题的延续与拓展。他的田野点在粤北乳源方洞瑶族村。我和他确定这个田野点的另一层重要原因是基于延续中山大学学术传统的考虑：这个点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开创者杨成志先生的早期田野点之一。1936年冬，杨成志先生带领研究生王兴瑞、江应樑等前往方洞（当时称“荒洞”）进行田野考察，调查成果在当时中山大学的《民俗》杂志上发表。我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不应该让这些珍贵资料自此尘封，而应该秉承老一辈学者的研究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出于这个考虑，我和何海狮同学商议，让他做方洞的人类学追踪研究。

实际上，粤北瑶山是早期中山大学的民族研究的重要领域。1941年春，杨成志先生再次带领研

* 作者简介：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中山大学环南中国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2009年，我让何海狮同学前往汝城做短期回访调查，发现他们已经正式被认定为“瑶族”。

究生梁钊韬、王启澍等前往乳源瑶山，对其中的乌坑瑶族村进行田野考察，调查成果亦在《民俗》杂志上发表。更早些的1938年，作为中山大学前身之一的岭南大学的外籍教师霍真（R. F. Fortune, 1939）带领社会研究所的部分学生到粤北连南瑶山的油岭排调查排瑶生活情况，随后其成果陆续在《岭南科学杂志》发表。这些成果包括排瑶的历史渊源、社会组织、家庭与婚姻、生计模式、宗教与信仰、语音体系等方面内容。

一、追踪与再研究相结合

何海狮随我读博士研究生以来，和我在海南、广东、广西等不同民族地方进行过田野调查，在对不同区域调查的基础上，最后，我们确定以杨成志先生早年的调查地——方洞为田野点。以广东粤北乳源瑶族为研究对象，考察瑶族社会的整体变迁。方洞是杨成志先生的早期调查田野点。开始，博士论文实则是一项对人类学的追踪研究。然而，当年杨成志等人发表在《民俗》杂志上的调查研究成果，均为专题式的调查报告，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歌谣传说、房屋建筑等，不一而足，而且调查时间也较短。这实际上为追踪研究添加了一些障碍。

何海狮和我讨论后，认为此项追踪研究不能完全延续和采用当时的分篇专题报告形式。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将这些专题报告打散重读，不拘泥于单篇或多篇的内容，而是将当初这些珍贵的研究成果作为方洞的整体社会与文化背景来看。我觉得，追踪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过程本身，即“时空穿越”自身的学术价值。这至少体现在两点上，第一，具有传统研究的接续。不管追踪研究采用何种形式，都是对传统研究生命力的再次彰显。换言之，接续研究本身就有其学术价值。第二，在时空转变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动，引出许多学术话题，如传统与现代、断裂与延续、流动与变迁等。我特别强调“时空穿越”本身在学术上的意义，并鼓励学生对前辈田野点进行多种形式的追踪调查研究。即便是前辈所记的某种仪式、某个现象、某种建筑消失了，在这“无”中，我们也可以读出很多丰富的内容，读出“有”来，我曾开玩笑说这是“无中生有”吧。何海狮在方洞进行初步调查后，向我表达了对能否完成此项追踪研究的担忧。我当时“搪塞”了他，只是让他继续深入做田野调查，给他宽宽心。其实，我心中有数，这类研究的价值就在于追踪本身。现在看来，何海狮同学的这份“答卷”，也再次印证了我的说法。

他在田野调查的中期，带我来到了方洞。至今进村的道路旁还是客家人居住的村落，越往里走，崎岖的山路越加陡峭，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开车的司机一直很紧张。然而，快到方洞村口时，在高山峻岭中出现了一块谷地，种着以水稻为主的农作物，小溪的流水声不时地与山谷相呼应，发出了仿佛佛境中的悠扬乐声。进到村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场景不时浮现在眼前。村里的人们非常朴实、热情，杨先生当年调查时所记述的一些建筑依然存在，先生的眼睛似乎还在看着我们。此时，我深感当年杨先生等前辈学者来此调查的艰辛。当然，现在这里的生活与内地的乡村已没有多大差别。经过踏勘，我更加相信不能囿于传统的追踪研究模式，而是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变迁过程和现在所呈现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

纵观何海狮的调查，他是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以方洞瑶族的家及社会结构为切入点，看瑶族社会的内在特点和变迁过程。这样，杨成志等前辈调查中关于瑶族经济、组织、宗教、歌谣、房屋等方面的描述就成为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显然，这种追踪研究方法与传统追踪研究有一定差别。何海狮的追踪研究并未直接延续前辈的核心话题。他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追踪研究”与“再研究”相结合，一方面，接续杨成志等前辈的诸多探讨，以历时性观点，在“时空穿越”中把握方洞瑶族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又沿着自身的思路进行，这思路就是家及其社会结构。^①在博士论文中他强调以家为中心的社会延续的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考察瑶族家庭与村落的组织、

^① 何海狮：《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2页。

《家先单》、度戒、盘瓠传说等主题。

二、类型比较与民族认同

在我和何海狮数不清的讨论中，恩师费孝通先生早期对瑶族的研究及其“六访瑶山”对南岭民族走廊的研究，也是我们的出发点。在对瑶族的研究中，尤其是对南岭民族走廊的瑶族的研究，是费孝通先生一直在推动的研究课题。早年，费孝通先生与妻子王同惠女士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田野调查，如果不是意外事故，他们将继续调查大瑶山的其他几个支系。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准备重续大瑶山调查，可惜年事已高，只能作罢。费先生于是倡导年轻学者继续这项研究，他希望从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出发，继而扩展到对南岭走廊的瑶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费先生提倡将“解剖麻雀”的微观调查和宏观上的类型比较法相结合，强调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通过类型比较法将瑶族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对宏观问题，诸如迁徙问题、认同问题、民族分合问题等的研究。比如，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困惑就是广西大瑶山的瑶族认同问题：

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说不同语言的集团，陆续进入瑶山，由于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保卫这个山区，汉族就把他们统称为瑶族，终于形成了现代的讲不同语言、有不同服饰、在习俗上也有一定差异的，由几个集团形成的叫做瑶族的统一体。为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语言一致的标准来进行民族识别。但我们也不能说大瑶山的瑶族不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尽管它是由五个来源不同的集团组成，而且还讲着分属三个语支的五种语言。于是这里便产生了诸多值得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是怎样起变化的？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方式等方面能承担多大的差异？为什么一个原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能长期被分隔在不同地区而仍然保持其共同意识？依然保持其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怎样能在不同条件下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不断壮大自己的共同体？又怎样会使原有的民族成分被吸收到其他民族中去？这些问题的提出将为我们今后的民族研究工作开辟出广阔的园地。^①

费先生的这一连串问题，涉及瑶族研究乃至更广大区域，包括对南岭走廊诸多民族的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很好地推进。我也试图接续费先生的研究脉络，将南岭走廊或更大的区域作为思考的背景。我用“民族”与“区域”“中心”与“周边”“记忆”与“认同”等多组概念进行深入思考。发现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深化对瑶族的认知。

何海狮的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费孝通先生关于“解剖麻雀”和类型比较的研究主张。在我看来，他目前的这本专著，在一定程度上也尝试以勉瑶为对象，试图回答费先生关于瑶族认同困惑中的“民族共同体”问题。何海狮认为，勉瑶的凝聚核心就是其独特的家先观念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勉瑶的家及社会结构。在这个核心的影响下，勉瑶社会特有的度戒仪式、十二姓氏瑶族传说、《家先单》等文化要素，发挥了创造族群边界、形成族群认同的作用。

何海狮认为粤北勉瑶的家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即一方面在继嗣与祭祀过程中，不断排除旁系，注重个体家庭的延续；另一方面，瑶人又极为注重原家，并以原家为起点，构建神话、传说及故事，达成一体感。这里所说“原家”指的是较为原初的始祖，在他的田野点方洞通常指两个人，一是乳源盘姓瑶族的始祖盘安衫，另一个是瑶族公认的始祖盘瓠。他指出，在方洞，瑶人并不关心彼此之间的具体谱系关系，但是皆认同是上述二人的直接后裔，并由此形成族群认同。也就是说，由原家出发构建族群认同，最直接的表现是基于姓氏的族群认同。

回到勉瑶所谓十二姓氏瑶传说，则这种族群认同更加鲜明。十二姓氏瑶人分散各处后，还愿祭祀仪

^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0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389页。

式也渐趋各异,20世纪80年代在瑶族各方努力下,创立统一的瑶族“盘王节”,其节日实质就是十二姓瑶人的祭祀与还愿仪式。何海狮指出,渡海神话的内核是对原家的记忆,十二个姓氏是以血缘为基础对原家进行缅怀,而还愿仪式所纪念的不单是保护他们祖先的神灵,更重要的是再次重申族群多灾多难的过去,以及十二姓瑶人的认同事实。^①

简而言之,何海狮试图从家的向度解答瑶族民族共同体问题。那么,与此相承接的问题是瑶族作为一个流动性极强的山地民族,“家”与“国”的关系如何,亦即瑶族与国家的互动究竟如何?

三、“无山没有瑶”与“国家在场”

2012年夏,我和何海狮前往广东省乳源县调查。当时我们和乳源县合作,在乳源建设了一个田野调查基地。我们刚到乳源时,正值县民族宗教局举办瑶文培训班,于是我让何海狮也去参加。这个瑶文培训班很有意思,名叫“世界过山瑶瑶语瑶文培训班”。其中“世界”一词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这个培训班是世界性的,即学员来自全球各地。泰国、缅甸和老挝的年轻瑶人都来参加,听说越南和美国的瑶人原来也计划来参加的,但由于政策、签证等原因未能如愿。第二层含义,指的是瑶语瑶文是世界瑶人通用的。当然这里的瑶语指的是优勉话即瑶族人数最多,迁徙最广的一个支系的语言。在培训班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瑶人聚在一起,居然可以用优勉话进行简单交流。第三层含义,指乳源县政府自称乳源是“世界过山瑶之乡”。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有东南亚和美国瑶人前往乳源瑶山寻根。他们中的一些盘姓瑶人认定乳源瑶山的盘姓开山祖盘安山就是他们的祖先。姑且不论这种认定是否为历史事实,但至少从目前东南亚瑶人留下的文字记录,以及度戒仪式等文化遗产来看,他们的祖先曾在广东瑶山停留与居住过。

这其实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过山瑶具有的高度的流动性。“流动”一词牵涉出瑶族研究中的许多话题。从我这些年来在南岭瑶族村寨,以及我的学生所做的调查看,“流动性”也是认识现代瑶族社会的关键词。针对南岭的瑶族至少有几个话题可以广泛讨论。第一,瑶族生计方式的流动性。在费孝通先生倡导下,胡起望和范宏贵的《盘村瑶族》一书就以瑶族生计转型为主要内容。该书将盘村瑶族生计模式定义为“游耕”,以显示瑶人耕作方式有游牧民居无定所之意。第二,物的流动。其中包括与生计相关的生产工具的流动。作为文化承载物的《家先单》和《过山榜》,显示出流动迁徙是瑶人社会的重要特质。第三,瑶人在流动中与周边民族的接触与融合。其中包括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与社会的往来共生(“货郎”经济、“认老庚”习俗),以及民族间的区隔、排挤与交融。

在此基础上,如何看待“国家在场”与瑶族流动,也是何海狮在书中思考的内容。瑶族从平地到山地的迁徙过程,伴随着王朝体系的扩张。这涉及斯科特的关于“逃离国家”的思考。^②在一定时期内,南岭就是一个“Zomia”,后来,明清两代朝廷对这片Zomia兴趣渐浓,但实际上依旧无法完全控制这片区域。到了现代国家体系建立之后,这片区域完全丧失了Zomia的特性,成为国家控制区域的一部分。

实际上,Zomia特性在这一地区并不是十分清晰,具有较强的模糊性。何海狮在此基础上借用并拓展“界域”一词的意涵,来描述这种模糊状态。他指出界域的两层含义。第一层,强调界域内人群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也是何翠萍等人的用法。第二层,强调“界域”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进而突出界域内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与互动及其对彼此社会型构造造成的重要影响。其中,他尤其强调第二层含义。他认为,南岭走廊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特质和其与外部民族、社会、国家的交流密切相关,交流本身是塑造其社会特质的重要因素,而交流必然带来模糊、交叠和不确定性的边界。他进一步指出,高地的“界域”本身无法超然于“界域”之外,这里的悖论是,高地一方面追求

^① 何海狮:《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259页。

^② 何海狮:《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267页。

“无国家”设计，一方面又处处与国家勾连。不过，这似乎并不见得是坏事，事实上，南岭山区的山地民族在这种既想“自主”，又“不由自主”的情境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南岭山地文明”。^①

还须注意的是，根据何海狮的研究，这种高度迁徙性在讲优勉话的瑶人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而这个支系也是瑶族中人数最多的支系。现在分布在东南亚和美国等地的瑶族大多为这个支系。区域不同，这个支系的名称也不同，比如，在乳源，他们被称为“板瑶”“箭头瑶”或“过山瑶”，而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他们被称为“盘瑶”。不过由于语言相通，他们的自称往往相同，称为 [mien]。为研究之便，我们也常用“勉瑶”称呼这个支系。

对勉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整个瑶族历史的梳理。20世纪80年代初，胡起望和范宏贵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关于开展广西大瑶山社会调查的倡议下，开始调查大瑶山瑶族五个支系中的盘瑶。当听完胡起望和范宏贵为何选点盘瑶村落为调查点的理由后，费孝通先生意识到，讲勉话的盘瑶可能是瑶族的民族基础，他们在游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游散成分，构成了各地瑶族的共同体。^②“勉瑶作为瑶族基础”的说法给我们很多启发，对勉瑶进行多角度“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研究，将能揭示更多关于瑶族变迁的细节。

四、从家族到民族

传统上所谈的中国的家族，主要是指汉族社会的家族，而作为不同民族共生的中国，家族的视角也是研究不同民族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切入点。对于民族的研究不能离开家族这个参照系。在一定意义上，家族是社会文化延续的基础。特别是在瑶族社会中，通过对家族记忆和现时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对于认识瑶族社会的民族认同与村落共同体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何海狮将瑶族的家先观念及家的结构放在一起考察的方法，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将人类学研究中文化传统与社会传统相结合的考察瑶族社会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拓展了我在《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中的研究思路，就是将文化上的家和社会结构上的家结合起来思考汉族家族的特质。但此种思路如何体现在对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呢？何海狮的研究就具有这种视角，他在家族记忆、社会结构和民族认同相结合的路径上展开对瑶族“家”的相关研究。

比如，他对瑶族的家先信仰的研究角度切入，继而与对社会结构的研究相勾连。这与福忒斯关于非洲的研究思路类似，福忒斯经典的《非洲部落社会的祖先崇拜》一文认为，祖先崇拜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家的延续。因此，对祖先崇拜的研究应直接与对相关社会结构的研究相结合。福忒斯以塔伦西社会的祖先崇拜为案例指出，从祖先崇拜的本质概念来讲，其崇拜群体的界限是由亲属制度、血缘关系及婚姻来规定的。他强调“祖先崇拜根植于家庭、亲属制度、血缘关系及社会制度”。换言之，福忒斯非常重视祖先崇拜在人群界定和区分中的作用。他说：“祖先崇拜并不单纯在于对血统和系谱的不朽的记忆。其目的只是简单地数学式地区分个人与群体，以便明晰相互的合法性地位。这显然不是一种纯宗教性质的祖先的仪式崇拜所必须的。”按照福忒斯的观点，对于祖先崇拜，不能作为纯宗教的性质去理解，而更应该强调其对社会结构的贡献，即区分人群、明晰合法性问题等。^③显然，何海狮延续了这种思路，试图在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对瑶族社会，尤其是家和家先的特质进行把握。在文化上，他强调瑶族的家先观念及其影响下形成的对度戒等仪式的信仰；在社会结构上，他指出瑶族社会是以家为中心的直线谱系结构。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作者提出的瑶人社会是“以夫妻为主轴的家的纵向延续理想”。作者认为，这是推动勉瑶社会运行的最

① 何海狮：《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页。

②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③ Fortes, Some Reflections on Ancestor Worship in Africa, in Fortes & Dieterlen eds., *African Systems of Thought: Studies Presented and Discussed at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rican Seminar in Salisbury, December 196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核心的理念及社会结构。

事实上,在民族研究中,家族记忆、祖先传说、社会结构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视角。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一书中对此有过较为系统的讨论。他指出,如同家庭中父母记住子女生日,家族成员记得开创祖一样,一个族群也需要强调其共同的起源,并且经常以共同的仪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强化这些集体记忆,甚至建立永久性的纪念物来维持集体记忆。^①而家族记忆是集体记忆的重要基础,由此可进一步讨论族群和民族的认同。

何海狮的研究表明,勉瑶的民族认同,与他们特有的“家”“族”特质直接相关。纵向延续的“家”的理念,是实践中形成的瑶族族群认同的社会结构的基础,而由此形成的十二姓氏的“族”的传说与仪式信仰,则构成瑶族族群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表面上是源于并借鉴于汉族的“家族”文化,经过瑶人的转变,发酵为瑶人自我认同的文化基石。

何海狮指出,勉瑶族群认同的维系方式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盘瓠神话、渡海神话、还愿仪式、家先信仰等,这些皆与勉瑶以姓氏为基础的原家记忆有密切关系。家先信仰自不必说,信仰的核心就在于直线型的家的延续。盘瓠神话追溯的是瑶人的始祖,盘瓠作为瑶族的原家,在瑶族重要的还愿仪式及度戒仪式中均被记忆和纪念。还愿仪式酬谢护佑之神的同时,重申了瑶人以姓氏和血缘为基础的对原家的追忆。他总结道:“家是瑶族社会的核心内容,因不断迁徙造成的‘无家’感,并没有使瑶人成为漂泊的无根之民族,反而让瑶人更为注重观念与记忆之家,并进而以原家以及由此形成的姓氏和血缘为基础,构建勉瑶的族群认同。”^②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于瑶族的跨界研究,也是对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以及对东南亚各国整体性区域研究的重要载体。希望今后何海狮能从跨界瑶族的角度,进一步深入对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各国的跨国研究,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的开展“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待着他今后的研究能迈出国门,进入全球化的视角,进一步拓展瑶族研究的新领域。

①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版,第 57 页。

② 何海狮:《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59 ~ 260 页。

史禄国与中国学术界关系考实

——以“云南调查事件”为中心

王 传*

摘 要：史禄国被誉为对中国民族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然其在中国学界的际遇，以“云南调查事件”为界限，前期礼遇尤佳，此后则受到学界诸多非议，惟傅斯年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史氏受到学界非议的原因有二：一是在学术转型时期，彼时中国学者学术视野狭窄，对国际学术新潮的把握严重不足；二是现下学界在研究材料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忽视了史氏作为该事件主角的主体叙事和主体意识的表达，致使整个调查事件中某些重要的事实长期未能被揭示出来。

关键词：史禄国；傅斯年；中大语史所；史语所；云南民族调查

DOI: 10.13835/b.eayn.18.02

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 1889—1939)，生于俄国中部的 Suzdal 市，1910 年获巴黎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回俄。“十月革命”之后，史氏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迫流亡海参崴，在远东大学教授“人种志”课程，1922 年后一直旅居中国，先后供职于厦大、中大、史语所、清华等教研机构，1939 年病逝于北平。在史氏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其生平学识渐为中国学界淡忘。直至 1994 年，其弟子费孝通发表两篇文章，追忆史氏的生平学术，其在中国的事迹逐渐引起海峡两岸学人的注意。然不幸的是，伴随着史氏研究的开展，因在云南调查中的“叛逃”行为，致其在中国学界的负面形象似乎难以摆脱。

学界对史氏在该事件中的研究论点，综合起来主要有三：一是以费先生为代表，认为史氏人类学研究是从“当时欧洲学术最前沿起步的”，其主张的人类学理论，“在中国不可能为同辈学者所理解”，中国学界大多不能读懂这位“世界级的学者”。^①第二种观点认为，史语所在 1928 年的云南调查中“所托非人”以至史氏“临阵脱逃”，“玷污了史语所的声誉”，而傅斯年为了顾及史语所的面面，“多方为之文饰”。^②第三种观点比较公允，认为史氏在云南调查提前离队，应该批评，但从理性来讲，彼时“史氏已经人到中年，功名成就，性情不免趋于平和，更何况家属在身边，需要关照，故不敢冒险。此乃人之本性，并非史氏之胆怯”。相反，正是因为史氏的胆怯，衬托出杨成志的可贵

* 作者简介：王传，历史学博士、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①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载费孝通著《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75、77 页。

^② 苏同炳：《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学生书局 2012 年版，第 38 页。

精神，成就了后来的创举，一举奠定了杨氏在中国人类学界的地位。^①

事实上，史氏在进入中山大学前后，尚有数种调查报告、论文手稿以及书信至今未曾发表。这些鲜为人知的材料原文俱在，迟早要经受学术史研究的严格审视。拙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云南调查事件”入手，重点发掘有关档件材料，多层次、多角度认识云南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研判史氏与中国学界的关系，进窥学术转型时期国内学界对国际学术新潮的理解与把握程度。

一、“事件”中的史禄国与傅斯年

史禄国任职中大，得益于任教厦大、深知史氏学术成就的张星烺大力举荐。1927年11月，张星烺致函中大教授罗常培，认为史氏学养深厚，读其书，“且与谈论，洵不愧为学者”，“此人极宜罗致，以增校光”。12月，罗氏回信告诉张星烺，中大语史所已预定聘任史禄国为研究教授，而史氏本人也亲赴广州接洽。^② 傅斯年与史氏在中大相遇之前是否认识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不过，在1928年4月5日，即史氏抵穗的第二天，傅斯年偕史氏同去拜访顾颉刚，可见至少在此时二人已建立了直接的交往关系。^③ 4月16日，史氏与中大校方正式签订聘用合同，规定史氏的工作须以中国南方人种研究为主，在学期内未外出调查时须在大学讲授人类学、人种学及实习等题目，负责训练研究助理和学生，以养成学生正确的科学知识、方法及实验操作的能力。^④ 因而史氏到粤不久开始用英语讲授《民族学之一般概论》，校方开设此科的目的是为将来开展人类学调查做预备。^⑤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1928年6月，中大校方宣布将田野调查地点选定在云南凉山，整个考察计划由史禄国主持，成员包括史氏夫人和杨成志，后又加派容肇祖会同前往。

目前学界对史氏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表现的材料，主要来自杨成志给傅斯年和顾颉刚的信件，这些信件均公开登载在《语史所周刊》上。另外，容肇祖给傅斯年的两封信件均未刊出，可能是因为信中对史禄国的不满言辞过于激烈。不过，这两封信的内容曾被台湾学者王汎森和苏炳同先后征引过，于是连同之前刊出的书信就成为学界研究云南调查事件的主要资料。

根据这些材料，云南调查的经过大致如下。7月12日，考察团由广州出发，先后经过香港、越南到达昆明。在昆明约一个月，因去凉山路上土匪未靖，“行期累延”，容肇祖因“中大开课在即”，不能久留之故，先行回粤。^⑥ 史禄国因不敢前往“土匪遍野，山谷崎岖”的目的地，这使杨“失望极了”。^⑦ 不得已杨成志选择千里走单骑，开始了长达两年以罗罗族调查为主的田野考察工作。据此，学界得出云南调查事件的基本结论是：史禄国胆小畏事，中途退出，成为众矢之的；杨成志则坚持调查，应受到褒扬。

1928年10月，史氏返回广州后，中大教授会开会并借助于英文翻译当面质问史禄国。不过，前后几次会议傅斯年不仅没有参加，反而力排众议，表达出明确支持史氏的态度。对此，顾颉刚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孟真极袒史禄国，此感情用事情，缉斋必欲去之，亦成见。予极畏事，而今乃不得不为调人。”^⑧ 在调查事件发生之后，面对中大校长与诸多教授一片质疑之声，惟傅斯年一人挺身而出为史氏辩护。傅斯年此举真如学界所说是为了挽留史语所的“颜面”么？还是另有隐匿的真相，

① 何国强等：《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以吴文藻、杨成志为例》，《思想战线》2005年第5期，第134页。

② 《张星烺与罗常培往来书信》，《语史所周刊》第13期，1928年1月23日，第26~27页。

③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51页。

④ *Articles of Agreement*，傅斯年图书馆藏史语所档案（以下简称“史语所档”），档案号：元46—14。

⑤ 傅斯年：《文科告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28年5月19日，第1版。

⑥ 《容肇祖致函傅斯年》，史语所档，档案号：元186—3。

⑦ 杨成志：《云南调查报告》，中大语史所，1930年，第11页。

⑧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17、218页。

颇值得深入辨析之。

梳理调查事件过程中斯年自始至终坚定地支持史禄国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认识。

第一，傅斯年对史禄国治学理念的认同。众所周知，傅斯年在欧洲留学期间，虽未修过历史学课程，但却广泛地听取了包括人类学、语音学、医学心理学等课程。^① 受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影响，早在1924年，傅氏归国前夕就极力强调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的重要性。^② 此后在中大、北大任教时，曾为学生开设《统计学方法论》《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对于统计学与历史学之关系均有不同程度的阐述，^③ 其《性命古训辨证》一书，就是一部运用统计方法来分析思潮的典范之作。^④ 1928年，傅氏在《史语所集刊》的发刊词中，说到“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主张将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引入史学研究领域，使史学研究“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并宣称“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⑤

在人类学研究的实践中，史氏扬弃了坐在书斋里用零星汇集的资料沿主观思路推论的欧洲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模式，而采取当时先进的亲身实地调查的实证主义方法。^⑥ 在史氏正式入职中大之前，其调查的足迹早已遍及中国的东北和华东地区，就这一点来说，与傅斯年所倡导的为收集研究的材料，走出书室，“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理念高度一致。

另外，史氏在进入史语所之前出版的《民族单元与环境》《华东和广东的人类学》和《中国人发育之研究——江浙之部》等著作中，运用了滑动竖尺、横规尺、双脚规等测量工具，来测量人体不同部位的数据，并用统计学方法处理了千余个调查对象的人体生物学的测量数据，借此来找到东亚人的体质类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史氏在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后，将体质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基础，而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理现象，去发现人体各部分生长过程中的差别。但史氏的研究并未停留在生物学的既定范围之内，而是“把生物现象接上社会和文化现象，突破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现在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从而把人置入自然现象这种，作为理性思考的对象，“建立一门名副其实的人类学”。^⑦ 由此可知，在以进化论为指导，并将数理统计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扩充研究工具；主张通过调查，扩充研究学问的材料等治学理念上，傅史二人高度契合，这是傅斯年支持史氏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傅斯年对与史禄国调查前后实际工作成绩的肯定。史语所保存有史氏给傅斯年的工作计划以及数封私人信件，用英文或法文书写。这些资料多成于云南调查之前，内容涉及史氏的调查研究工作计划及实施情况，多带有一定的私人交流的性质，除了傅斯年之外，外人恐鲜少知晓。1928年，史氏甫至广州，向傅斯年提出如何发展中国人类学的构想。史氏计划首先训练一批助理员，对中国南北部，以及长江流域的居民进行人类学体质测量，这些测量计划实际上是史氏先前在上海时对江浙一带人类学调查工作的延续。史氏拟在完成中国全境的人类学调查之后，最终著成《中国人

①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和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69页。

② 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傅斯年著《傅斯年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③ 参见马亮宽、李泉《傅斯年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④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00页。

⑤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著《傅斯年全集》（三），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2页。

⑥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载费孝通著《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4、75页。

⑦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载费孝通著《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4、85页。

体质发育的进程》一书；^①其次，除了计划测量中国各地人种体质之外，认为最迫及之任务有三项：在广州建立人类学研究中心，其工作包括一所“特别实验室”，用来收藏中国境内骨骼和头骨材料，以及比较人类学材料，并在其监管之下，在当地设立民族志博物馆中心；尽快出版调查研究的结果；通过公众演讲及其他方式对人类学进行宣传。^②在史氏看来，从事这些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工作，为蹒跚学步的中国人类学工作者“起到一个好的范例”。^③

此外，由于前往云南预定区域的工作计划屡次延误，不得已史氏将调查集中在昆明及其周边地区。从最终的调查结果来看，收获不可谓不丰。在昆明附近，史氏先后对学校学生和犯人，以及士兵进行体质测量。同时，在昆明城周边最大范围内搜寻罗罗人，并尽可能通过他们的语言来进行交流。后来，随着出发的时间再一次被推迟，史氏“幸运”地找到了更多的罗罗人，遂将在昆明进行人类学调查的工作由个人扩大到新的群体（家庭）。通过数月的调查，先后在学校、监狱、军校、中小学等单位完成活体测量两千余例。对于这些材料，史氏颇自信地认为“与南方的族群在源流上建立了某种联系”。^④此外，《中国南方人发育论》、《中国南方人类学》（第一部）先后在广东完成并出版，史氏在粤期间工作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

1930年5月8日，中大校方函告傅斯年，史禄国因“聘约现届期满，拟不续定”。^⑤5月23日，史语所随即召开所务会议，会议委员会对于史氏两年来所从事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欣赏”，决定任命他为专任研究员，并尽快出版其手稿。^⑥1929年，史语所主体迁至北平，考虑到广州及其周边省份因有丰富的人类学材料可供调查研究，傅斯年将史语所人类学组作为支部继续留守广州，并将在粤的研究工作与所务托付史氏主持，足见傅氏对其前期工作的肯定。

第三，傅斯年筹办史语所，夺取“东方之正统”，网罗“志同道合”的研究班底，在汉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史禄国无疑是最佳人选。史语所创所的核心理念是“学贯中西”。1928年初，史语所筹备期间，傅斯年主要以中大研究人员为基础，除史禄国之外，其他学者如顾颉刚、罗常培、董作宾等人，都是未出国门的本土学人，以这样的团体恐难与外人争胜。于是到五月份的时候，傅斯年重新规划，拟聘胡适、陈寅恪、赵元任、刘复、李济、冯友兰、余大维等留洋的新派学者十数人。由此一方面可见傅斯年治所的国际化视野；另一方面反映出他要与欧洲汉学一较高下的学术雄心。^⑦

傅斯年的学术雄心，从其与顾颉刚的学术争执中可见一斑。彼时的中大语史所，以顾颉刚为首的学者群，开展的民俗学运动正如火如荼，但是从该所所出版的一百余期刊物，以及39种民俗学著作中，并未看见傅斯年的只字片言。当顾颉刚在《民俗周刊》发刊词中积极提倡“站在民众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拼命”印刷《民俗丛书》时，傅斯年却认为“这本无聊，那本浅薄”；^⑧并谓顾颉刚是“上等的天分，中等的方法，下等的材料”，带有嘲讽意味地建议顾颉刚抛弃历史学改“向民俗学方向发展”。而顾颉刚却认为：“材料是客观实物，其价值视用之者如何耳。岂能分高下乎！”^⑨这些，与其说是傅、顾二人对民间材料的态度不同，不如说是二人在治学总体精神上存在差异，从后来他们在史语所筹备时的分歧中可以看到：傅旨在提高，而顾则重视基础。

① S. M. Shirokogroff: *Scheme of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台北史语所档，档案号：元46—7。

② S. M. Shirokogroff: *Scheme of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台北史语所档，档案号：元46—7。

③ S. M. Shirokogroff: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台北史语所档，档案号：元46—8。

④ S. M. Shirokogroff: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Work in Yunnan*, 1928. 台北史语所档，档案号：元46—5。

⑤ 《沈鹏飞致傅斯年》，台北史语所档，档案号：元46—41。

⑥ 《傅斯年致史禄国》，《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2011年，第329页~330页。

⑦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第21页。

⑧ 《顾颉刚致胡适的信》，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32页。

⑨ 参见《顾颉刚日记》（1929年2月13日）第二卷，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52页。

据顾回忆，当时他与傅斯年、杨振声三人奉命商量筹备史语所时，由于杨振声是文学出身，对史语所方向性建设不置一词，而他与傅斯年的“胸中皆有一幅蓝图在”。^①傅斯年倡导科学方法，力求专精，以提升中国的学术品质，扬言近代学术只是少数或几个人的事，主张“只要有十几个学究的书院，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在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②而顾则不同意傅的看法，主张以普及为要务，认为：“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作提高者之基础也。”^③

俩人出现此种争议实与各自的学术经历有关。顾回忆到：“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后尘，且与之角胜，故旨在提高”。^④杜正胜指出傅“表面上向外人学习，内心里则把西方的汉学家当做主要的对手”。^⑤他们的分歧起先是引起“口角”，后来进一步恶化发展成“破口”对骂，遂使二人“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⑥恰在傅、顾治所思想出现分歧之时，中央研究院准备在中大语史所基础之上筹备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竭力忙于筹备工作，无暇顾及语史所事务，这正好给了顾颉刚贯彻其治所精神的最佳时机，因而语史所倡导的“眼光向下”的研究姿态正是顾颉刚治所思想的反映，而与傅斯年的关系不大。杜正胜在评价语史所、史语所时认为两所“一个土派，一个洋派，可以说是不同体质的双胞胎”，^⑦这也正好说明了顾、傅二人办所方针虽有所不同，但各具特色是明显的。

以傅斯年治所的眼界与目标，创立史语所“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⑧以这个标杆来说，至少在汉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要得到与欧洲争胜的目标，史禄国是位难得的合作伙伴。如果从国际人类学发展史来看，史禄国作为一战后初露头角的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其研究理论与实践是从当时欧洲学术最前沿起步。^⑨在史氏入职中大前后，其调查的足迹遍布中国东北、江浙沪、皖、粤等地，以实证主义的方法写成的论著发表之后，已引起了来自于英、法、美、德等欧美人类学界的广泛关注。如1928年4月，C. W. Bishop教授曾对史氏发表的论文展开评论。认为史氏通过个人的努力，在经历无数的困难与失败后，“以其大量客观的体质测量，奠定了人们对东亚认识的基本知识，从而取代了先前人们作为旅行者认识东亚的主观印象，应得到不小的赞许”。^⑩由于史氏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兼顾通古斯的体质类型和文化两方面的讨论，对通古斯的研究具有突出贡献，被誉为“通古斯人类学的杰出权威”。^⑪诸如此类的赞誉，还有很多，兹不赘言。纵览当时世界学术界，在汉学人类学研究的领域，无人能出其右，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邀请史氏进入史语所，对于傅斯年来说，至少能实现在汉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超越欧洲“汉学”的目标。

史禄国没有辜负傅斯年的期望。史氏虽然在史语所的时间不长，但之于史语所的贡献不小。前史语所所长杜正胜赞誉史禄国“在中国人类学界的角色或可比拟考古学界的安特生”。^⑫另一位熟悉史

①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59~160页。

②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三），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③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59~160页。

④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59~160页。

⑤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第20页。

⑥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60页。

⑦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第16页。

⑧ 傅斯年：《傅斯年致函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全集》（三），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⑨ 费孝通：《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载费孝通著《师承·补课·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4、75页。

⑩ C. W. Bishop, “Anthropology of China,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18, No. 2 (Apr., 1928), p. 343.

⑪ I. A. Lopatin,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33, 4 (Oct.—Dec., 1931), p. 637.

⑫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杜正胜、王汎森编《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第30页。